

唐前期西州地区“计租六斗”新论

张新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通过唐前期西州户籍文书中所登载的租税数额,可以发现西州地区的租税数额较为特殊,对于西州“计租六斗”租额的认识,目前学界尚存分歧。本文结合敦煌“宽乡”与西州“狭乡”地区的给田基准额以及相关史料,对“计租六斗”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租二石”和“租六斗”均与不同的给田基准额有关。正是因为西州“狭乡”丁男的给田基准额是6亩永业田,所以应输纳的租额是6斗。“计租六斗”既是西州赋税制度特殊性的体现,又与唐《赋役令》的规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关键词】租二石;租六斗;给田基准额;租粮种类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2-0049-09

The New Study on “Zu six Dou” in Xizhou Region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ZHANG Xin-gu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amount of taxes registered in Xizhou household register document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paper explains that Xizhou area's tax policy was more special. Currently the academic field has several views on “Zu six Dou (计租六斗)”. In 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the standard amounts of fields given in Dunhuang and Xizhou regions and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new opinion on “Zu six Dou”.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Zu two Dan(租二石)” and “Zu six Dou(租六斗)” we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standard amounts of given fields. Because the standard amount of given farmland was six Mu in Xizhou region, the amount of paid taxes was six Dou. The amount of “Zu six Dou” reflected not only the tax system was special in Xizhou region, but also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Tang Dynasty Laws on the Taxes and Corvee.

Key words: Zu two Dan; Zu six Dou; the standard amounts of given fields; the types of Zuliang

在吐鲁番出土唐代西州户籍文书中,“计租六斗”表明唐前期(618-755)西州地区一丁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是“六斗”,显然这与唐《赋役令》所规定每丁租二石(粟)的标准不同。两者之间虽然差异很大,但也有一定的联系,笔者认为,“租二石”与“租六斗”都与给田基准额有关,正是因为西州“狭乡”地区与敦煌等其他“宽乡”地区一丁的给田基准额不同,因此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也不同。

【收稿日期】2015-10-2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籍文书研究”(2015M572519)

【作者简介】张新国(1980-),男,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隋唐史与敦煌吐鲁番学。

一、西州租税数额与唐《赋役令》规定的差异

从唐前期西州户籍文书中所登载的租税数额可以看出,西州地区丁男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是“陆斗”,但从唐《赋役令》中的规定来看,一丁应输纳的租额是二石(粟)。从容量单位来看,这两种租税数额差别很大,“石”和“斛”是同级容量单位,一石(斛)等于十斗^①,显然西州地区一丁输纳的租税数额不同于唐《赋役令》中的相关规定。

(一)唐《赋役令》所规定的租税数额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赋役的主要形式。关于唐前期丁男的租税数额,据唐《赋役令》规定:“每丁,租二石……此是每年以法赋敛。皆行公文,依数输纳。”^②又如,据《唐六典》记载:“课户每丁租粟二石……皆书印焉。”^③从相关史料中的记载来看,《旧唐书》、《唐会要》与《唐六典》中的记载基本相同^④,唐前期一丁(男)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均是“租粟二石”。只是《新唐书》中的记载与以上三者有些差异,据《新唐书》记载:“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⑤从《新唐书》中关于唐代“租税”的记载来看,与《唐六典》等史料中的不同之处则体现在“粟二斛,稻三斛”^⑥方面。除此之外,在唐前期敦煌籍帐文书中,也有相关例子可以印证唐代丁男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例如,在《唐开元四年(716)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⑦中,就可以看到在多户家庭的户籍中都明确载有每丁“计租二石”的租税情况。

结合《唐律疏议》、《唐六典》、《旧唐书》、《唐会要》等史料中的记载来看,在唐前期,一丁(男)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是二石(粟),即20斗。对于岭南诸州、夷獠之户或蕃胡内附者,唐政府均有不同的租税政策^⑧。

但对于西北边远地区西州的租税数额,在史料中却没有相关记载说明。在西州户籍文书中,笔者发现西州地区有四件文书中都明确载有“计租六斗”的字样,显然,西州“狭乡”地区“计租六斗”的租税数额要比唐《赋役令》所规定一丁租二石(粟)的标准低得多。对此,笔者认为,在唐前期西州地区也应有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独特的租税标准。

(二)唐前期西州地区特殊的租税数额

关于唐前期西州地区一丁(男)的租税数额,在西州户籍文书中,较早的一例就是《唐贞观二十一

① 对于“石(斛)”和“斗”之间的换算关系,1石(斛)等于10斗。据《旧唐书》记载,“凡权衡度量之制……三斗为大斗,十大斗为斛。”参见刘昫《旧唐书》卷48《食货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9页。

② [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13《户婚·差科赋役违法》,中华书局,1983年,第252页。

③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中华书局,1992年,第76页。

④ 据《旧唐书》记载,“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参见刘昫《旧唐书》卷48《食货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8页;据《唐会要》记载,“武德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赋税。……每丁岁入粟二石”,参见王溥《唐会要》卷83《租税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13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51《食货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342页。

⑥ 李锦绣女士认为,“粟二石”是租的本色品种及数量,稻是折色,租稻三斛可折粟二斛(石),两者属于定量折纳。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44-445页。

⑦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38-144页。

⑧ 据《旧唐书》记载,“(武德七年)赋役之法……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参见刘昫《旧唐书》卷48《食货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8-2089页。

年(647)帐后□苟户籍》文书中所登载的“计縹布□疋,计租六斗”^①的租调情况。在“□苟”一家的户籍中,户主“□苟”的年状是“丁男”,身份是“白丁”,户内应受田人口与“课口”仅有户主“□苟”一人,该户所应输纳的租调数额是“计縹布□疋,计租六斗”。虽然“调”的数额缺失不全,但该户的“租”的数额较为明确。因此,从“□苟”一家的租税数额来看,丁男“□苟”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是“六斗”。

不但贞观年间西州地区一丁(男)的租税数额是“六斗”,即便是在唐开元年间,西州地区一丁(男)的租税数额也是同样如此。例如,在《唐开元二年(714)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文书中,同样载有“计縹,计租六斗”^②的租调数额情况。此外,相关的例子还有《唐开元四年(716)西州高昌县安西乡安乐里籍》中所载录“计縹□□,计租陆斗”的租税数额,文书录文如下:

(前略)

21 户主○○○ □

22 故兄妻□ □

23 女念念 □

24 男小 □

[中缺]

25 计縹 □ □

26 计租陆斗

27 壹拾亩永业

28 壹拾亩肆拾步已受

29 应受田柒拾陆亩 肆拾步居住园宅

30 陆拾伍亩贰佰步未受

(后略)^③

从唐开元年间西州地区户主“○○○”一家的户籍情况来看,虽然该户户主的相关信息残缺不全,但从该户户籍中应受田 76 亩的数额来看,完全符合唐《田令》关于“狭乡”地区一丁男(60 亩)、一寡(15 亩)、外加 1 亩居住园宅的授田规定,再结合该户所应输纳的租调数额,可以判定该户户主应是“丁男”,又因该户户内符合受田条件的男性家庭成员仅有户主一人,因此户主“○○○”就是“课口”^④,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是“六斗”。这个例子也同样说明在唐前期西州地区一丁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是“六斗”。

上述所举《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帐后□苟户籍》等三份户籍文书中所登载的租税数额的情况可以说明,从唐贞观一直到开元年间西州“狭乡”地区一丁的租税数额应是“六斗”。

对于西州地区的租税数额,杨际平先生认为:“唐前期西州,丁男计租六斗,这也是唐代西州的特殊性,但就唐代边远地区而言,赋役制度不同于内地,则又带有普遍性。”^⑤

①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 6 册,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101-102 页。以下简称为《吐鲁番出土文书》。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 8 册,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285 页。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 8 册,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316-317 页。

④ 据《新唐书》记载,“寡妇”虽是受田对象,但属于“不课口”。参见《新唐书》卷 51《食货一》,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343 页。

⑤ 杨际平:《对敦煌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 9 期。

二、学界对“计租六斗”的解释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有关唐代西州地区租税数额的文书共有4件^①,其年代主要集中在唐贞观和开元年间,在《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帐后口苟户籍》等4件户籍文书中都明确登载有西州地区的租税数额,即“计租六斗”,这一租税数额显然与唐《赋役令》中的规定不同。

对于唐前期西州地区这一特殊租税数额的研究,长期以来,前辈学者虽有相关探讨,但学界尚存分歧。目前对“计租六斗”的解释,李锦绣女士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李锦绣女士在《唐代财政史稿》一书中对西州地区“计租六斗”的问题做过具体分析,她指出粟与米的斛斗折纳比率是1:0.6,即一石(斛)粟折米六斗。也就是说“米六斗”的租税数额相当于唐《赋役令》中“每丁租(粟)二石”规定的一半,依据粟与米的折纳标准,李锦绣女士进一步指出西州地区“租六斗”应是指米额,而不是粟额,“租米六斗”的数额体现了狭乡减半的租调律^②。对于李锦绣女士的观点,李方女士则认为李锦绣关于“计租陆斗”指米额的分析颇有新意,但同时也指出西州地区不可能盛产稻米,并结合《唐西州高昌县崇化乡里正史玄政纳龙朔三年(663)粮抄》^③文书中“征粮小麦陆斗”的例子,说明西州地区的租粮似应包括小麦^④。对此,张弓先生也指出史玄政所纳的“征粮(小麦)”可能是正租^⑤。

从李锦绣女士的观点来看,米与粟的斛斗折纳标准可以在史料中找到相关记载^⑥。但依据李方女士以及张弓先生的观点来看,西州地区租粮的种类似应包括“小麦”。至于小麦与粟之间的斛斗折纳标准,在史料中也有相应依据,据复原后的唐《仓库令》第八条规定,小麦斛斗出给与粟的比率相当^⑦,即两者之间的折纳比率是1:1。这就说明“租(麦)六斗”并不是“租(粟)二石”的一半,也就是说,“租麦六斗”并不符合狭乡减半的租调律。因此,在笔者看来,西州地区“计租六斗”的特殊租税标准似应另有其他依据,西州地区“租”的种类也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三、笔者对“计租六斗”的认识

西州狭乡地区“计租六斗”的租税数额虽然比较特殊,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不仅与当地一丁(男)的给田基准额密切相关,而且与宽乡的给田基准额和租税数额也有一定的关联。要深入探讨“计租六斗”这一特殊数额及相关问题,首先就要对“租二石”与宽乡授田基准额之间的关系做一梳理。

(一)“租二石”与宽乡授田基准额的关系

① 除上述所举《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帐后口苟户籍》等三份户籍文书中载有“计租六斗”的例子之外,另外在《唐开元初年西州籍》中也有相关记载。参见[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录文与插图第105页。

②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6-457页。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87页。

④ 李方女士认为“征粮”应指均田农民交纳的“租粮”。参见李方《从史玄政的一生看高宗、武则天时期昭武九姓胡人的生活状况》,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5-286页。

⑤ 张弓:《唐朝仓廩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第5页。

⑥ 据《通典》记载,“诸租,准州土收获早晚,斟量路程险易远近,次第分配。……若无粟之乡,输稻麦,随熟即输,不拘此限。……应贮米处,折粟一斛,输米六斗。其杂折皆随土毛,准当乡时价。诸边远州有夷獠杂类之所,应输课役者,随事斟量,不必同之华夏。”参见杜佑《通典》卷6《食货六·赋税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109页。

⑦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486、494页。

在唐前期“宽乡”地区,依据唐《田令》的规定,18 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应受田的数额是 20 亩永业田和 80 亩口分田,对于当户的黄、小、中男女以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亦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依据唐前期敦煌“宽乡”地区大多普通民户的实际受田情况来看,虽然每户所受口分田数额多少不一,但 20 亩永业田基本都能保障足额给授。对此,韩国磐先生也指出,虽然民户田土的已受率各不相同,其中口分田的已受率更是千差万别,但各户永业田几乎都能基本实现受足^①。对于这种现象,韩国学者金圣翰先生则进一步指出,在唐代均田制下,宽乡的给田基准额即是 20 亩永业田,并以此为标准征收租调,而对口分田的给田数额国家则未给予保障,所以在敦煌户籍文书中才会出现所载口分田受田数额不均等的情况^②。

从金圣翰先生的观点可以看出,唐前期“宽乡”地区民户给田的基准额是 20 亩永业田,与这一给田基准数额^③相对应,“宽乡”民户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则是粟二石(即 20 斗)。对于这一观点,邢铁先生认为,尽管全国各地都存在授田不足的情况,但租粟仍按原定数额征收,而且敦煌户籍残卷所反映的情况也基本一样,这就说明授田时先满足永业田,租额主要出自永业田,与口分田关系不大^④。根据唐前期“宽乡”民户受田基准数额(20 亩永业田),再结合金圣翰与邢铁两位先生的观点,笔者以此推

表 1 唐前期敦煌“宽乡”民户受田数额与租税情况调查表

文书名称	文书 段数	户主 姓名	受田人口	受田数额		租税数额	文书出处
				永业田	口分田		
《武则天大足元年(701)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	(一)	邯寿寿	一丁男一寡	20 亩	23 亩	计租二石	《敦文献》 ^⑤ 第一辑第 130-134 页
《唐开元四年(716)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	(一)			20 亩	16 亩	计租二石	《敦文献》第 1 辑第 138-144 页
	(二)	董思昂	一丁男一寡	20 亩	8 亩	计租二石	
	(三)	余善意	一老男一丁男	20 亩	7 亩	计租二石	
《唐开元十年(722)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		杜客生	一卫士一丁男	39 亩		计租二石	
	(五)	赵玄表	一丁男	20 亩	5 亩	计租二石	《敦文献》第 1 辑第 145-153 页
《唐开元十年(722)沙州敦煌县莫高乡籍》	(一)	王万寿	一丁男	10 亩		计租二石	《敦文献》第 1 辑第 154-155 页
	(二)	白树合	一丁男			计租二石	
备 注				(1)董思昂本人虽属“残疾”,但其户籍中仍注有“课户见输”的字样。 (2)余善意一家受田人口虽是一老男和一丁男,根据唐《田令》的规定应受永业田 40 亩,但仅有一丁男需要输纳租调赋役。 (3)杜客生的身份是“卫士”,其本人属于“免课役”的对象,所以杜客生一家仅有一丁男需要输纳租税“计租二石”。			

① 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213 页。
② [韩]金圣翰:《唐代均田制下宽乡的给田基准额》,《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③ 根据唐《田令》的规定,虽然“宽乡”口分田的给授,依据不同受田群体有 80 亩、40 亩和 30 亩三个标准,但从唐前期敦煌户籍文书中民户“已受田”的数额来看,大多普通民户所受口分田数额均严重不足,而且口分田的给授数额多少不一,甚至有些家庭没有授给口分田,因此,从民户整体受田情况来看,口分田的数额是一个变量,唐代宽乡的租税数额(粟二石)不可能是以民户所受口分田数额作为征调依据。对此,笔者认为,唐前期的租税数额是以“宽乡”民户所受的 20 亩永业田为基准征调数额。
④ 邢铁:《均田制与租庸调关系的辨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
⑤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在本表中简写为《敦文献》。

测每亩基准额的永业田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是粟一斗。

这一租税数额相对民户实际受田情况来讲并未加重农民的负担,以敦煌“宽乡”地区为例,就大多民户实际受田数额来看,均要多于 20 亩永业田的基准数额,因为除所受永业田之外,宽乡民户还会被授予一定数额的口分田,所以唐前期的租税数额(粟二石)与“宽乡”民户实际受田数额相比而言并非繁重。

对于唐前期敦煌“宽乡”民户受田数额与租税情况之间的关系,在敦煌户籍文书中也有一些相关例子,笔者现对唐天宝以前敦煌籍帐文书中涉及民户租税数额的家庭逐一作了统计,详细内容如下(参见表 1)。

从表 1 唐前期敦煌部分民户实际受田情况来看,在邯寿寿等八户家庭中,除了王万寿与白树合^①两家之外,尽管每户所受口分田的数额差异很大,有些家庭甚至没有口分田,但可以说每丁(男)应受 20 亩永业田基本都能足额给授。就表中所列家庭的受田数额与其租税情况之间的关系来看,不论民户所受口分田或多或少,每丁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均是二石(粟),这也可以说明唐前期“租”的数额应出自民户所受永业田的基准额。

以上论述可以说明,唐前期“宽乡”地区民户给田的基准额是 20 亩永业田,因此每丁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是二石(粟)^②。

(二)“租六斗”与狭乡授田基准额的关系

在唐前期,与“宽乡”的给田基准额(20 亩永业田)不同,在西州“狭乡”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特殊、地狭人多,普通民户实际受田数额严重不足,不但基本没有口分田,甚至 20 亩永业田都不能足额给授。与敦煌“宽乡”相比来讲,西州“狭乡”土地的授受则另有标准,一丁的授田基准额仅是 6 亩永业田(常田 4 亩,部田 2 亩)。这在吐鲁番文书中就有相关例子,例如,在《唐侯菜菌子等户佃田簿》中就有“壹丁合得常田肆亩,部田贰亩”的记载。文书录文如下:

[前缺]

1 亩价小麦未给

2 户主侯菜菌子年五十

3 合佃常田拾捌亩半玖拾步,部田拾壹亩。壹丁合得常田肆

4 亩,部田贰亩。准折还主,外剩常田捌亩半陆拾步,上价;陆

5 亩叁拾步,中价;部田肆亩[]亩,下价。合征大麦拾贰硕肆

6 斗柒胜(升)半,小麦伍硕伍斗[]

7 户主令狐僧海年[五]十八 男沙弥子年廿九

8 合佃常田柒亩壹百步。壹丁合得常田肆亩,部田贰亩。欠常田

9 半亩贰拾步,部田肆亩。价大小[][]给。

(后略)^③

从《唐侯菜菌子等户佃田簿》来看,“壹丁合得常田肆亩,部田贰亩”则表明西州“狭乡”一丁给田的

① 在“王万寿”一家的户籍中,所受永业田数额仅是 10 亩;在“白树合”一家的户籍中,受田数额信息缺失。

② 租税如输纳其他农作物,则需与“粟”定量折纳或按当时价进行折纳。参见杜佑《通典》卷 6《食货六·赋税下》,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09 页。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 4 册,文物出版社,1983 年,第 239 页。关于《唐侯菜菌子等户佃田簿》这份文书年代的断定,鲍晓娜认为本件文书属于唐开元年代,参见鲍晓娜《唐代西州均田制的实际授田标准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第 21 页;卢向前先生则认为这件文书属于唐贞观年间,参见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95 页。从与本件文书一同出土的其他文书的年代来看,笔者认为这件文书的年代应属于贞观年间。

基准额是 6 亩。对此,鲍晓娜认为:“吐鲁番地区在唐代前期,至少是从武周载初元年至开元末,在推行‘均田制’时,曾实行了一种与唐令的一般规定不同的、独特的给田标准,即一丁得常田 4 亩,部田 2 亩,老寡减半。”^①

在吐鲁番文书中不仅载有西州“狭乡”丁男的给田基准额,而且还载有老男与寡妇这两个群体的授田基准额。从吐鲁番文书中的相关资料来看,因为老男与寡妇均是“非课役”的对象,其给田的基准额则是 3 亩。例如,在《唐请地簿》中就载有“老、寡,人得常田贰亩部田壹□”的例子。文书录文如下:

[前缺]

- 1 伍
- 2 拾捌
- 3 合应请地丁、中
- 4 玖拾丁 人得常田
- 5 伍次男 人得常
- 6 老、寡 人得常田贰亩部田壹□

[后缺]^②

从《唐请地簿》可以看出,合应请地的人员包括丁男、中男(次男)、老男以及寡妇等不同群体,对于老男与寡妇这两个群体的请田标准,文书中登载的具体数额是 3 亩(即常田 2 亩、部田 1 亩)。与《唐侯菜菌子等户佃田簿》中丁男的给田基准额相对应,《唐请地簿》则补充了老男及寡妇的给田基准额。

综合上述两件文书所反映的授田或请田数额,可以明确说明唐代西州“狭乡”地区曾施行过独特的给田标准。对于唐代前期西州“狭乡”的给田基准额,卢向前先生则明确指出在唐代西州的田制中,一丁授田的基准额是常田 4 亩、部田 2 亩,并且从西州成立初期经高宗龙朔、中宗景龙,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授受基准,一直都被实行着^③。

但在吐鲁番文书中,就西州大多民户实际受田数额来看,均要多于 6 亩的基准数额,通常以“常田 4 亩,部田 6 亩”的标准额出现为多^④。因为“计租六斗”仅是出自丁男受田的基准额(6 亩)部分,所以相对于每丁受田的标准额(10 亩)来讲,这一租税数额(租六斗)也并非繁重。

以上论述同样可以说明,在唐代西州“狭乡”地区,一丁给田的基准额是 6 亩永业田,因此所输纳的租税数额应是 6 斗(粟)。

(三)“租六斗”与“租二石”之间的关系

根据以上论述,从“宽乡”与西州“狭乡”地区的给田基准额来看,仍以敦煌为例,“宽乡”一丁给田基准额是 20 亩永业田,应输纳租税“二石(20 斗)”;西州“狭乡”一丁给田基准额是 6 亩永业田,应输纳租税“六斗”。

从敦煌“宽乡”与西州“狭乡”地区给田基准额与租税数额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唐前期租税的征调数额是以给田基准额为依据,即每亩给田基准额应输纳的租税数额是一斗(粟)。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西州地区“计租六斗”的租税数额则是唐政府结合西州边陲地区民户实际受田数额严重不

① 鲍晓娜:《唐代西州均田制的实际授田标准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 4 册,文物出版社,1983 年,第 237 页。在《唐请地簿》第 6 行录文中,笔者认为,此行中的“老、寡”分别应是指“老男”和“寡妇”两个群体。

③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93-95 页。

④ 卢向前先生把“常田 4 亩,部田 2 亩”称作为基准额,而把“常田 4 亩,部田 6 亩”称作为标准额。参见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11 页。

足的客观情况,因地制宜,在政策上对唐《赋役令》灵活变通的结果。

因为西州“狭乡”与敦煌等“宽乡”给田基准额之间的比例关系是 6/20,同样可以得出西州“狭乡”地区一丁所应输纳的租税数额亦是敦煌等“宽乡”地区的 6/20,因此西州地区“租六斗”仅是唐《赋役令》所规定一丁“租二石(20 斗)”这一数额的 3/10。

(四)西州地区“租”的种类

关于西州地区的作物种类,据《魏书·高昌传》记载:“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又饶漆。”^①同样,在《周书·高昌传》中也有相关记载:“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②此外,在《旧唐书·高昌传》中也有相关材料:“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蒲萄酒,宜五果”^③。从《魏书》、《周书》以及《旧唐书》等史料中关于高昌的记载来看,在高昌地区常见的作物品种至少应当包括粟与小麦这两种作物^④。而且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诸多关于“粟”以及“小麦”等作物的记载,例如,在《唐借贷仓粮纳本利帐》^⑤这件文书中就有“小麦”作为借贷仓粮的记载。在《唐粮食准小麦时价牒》^⑥中也有其他粮食作物与“小麦”这种作物折价的具体标准。又如,在《唐索善相等入粟帐》^⑦中还有“粟”这种粮食作物的记载。

从史料记载以及吐鲁番文书中的相关材料都可以说明,“粟”与“小麦”应是西州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

对于唐前期民户所纳“租”的种类,据《通典》记载:“诸租,准州土收获早晚,斟量路程险易远近,次第分配。……若无粟之乡,输稻麦,随熟即输,不拘此限。……应贮米处,折粟一斛,输米六斗。其杂折皆随土毛,准当乡时价。诸边远州有夷獠杂类之所,应输课役者,随事斟量,不必同之华夏。”^⑧从《通典》中的记载可以看出,“租”的种类既可以是“粟”,也可以是“麦”、“稻”、“米”或者其他杂物等。

既然西州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粟”与“小麦”,那么西州地区所输纳的租税也应是“粟”与“小麦”。况且从吐鲁番文书来看,西州地区既有课“麦”,又有课“粟”的记载,例如,在《唐典焦玄素牒为麦粟帐事》中就载有“十二□月计当课麦”的例子。文书录文如下:

- 1 十二□月计当课麦
- [中缺]
- 2 合一石一斗五升二合麦,二石五斗五升六合粟
- 3 壹拾捌文计当粟肆
- 4 四月上碓底雇近
- 5 一石停两日计课粟二
- 6 四斗一升一合二勺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 101《高昌》,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243 页。

② [唐]令狐德棻:《周书》卷 50《高昌》,中华书局,1971 年,第 915 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198《西戎·高昌》,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293-5294 页。

④ 因为“粟”是谷的种类之一,也是唐政府所规定的主要“租粮”类型之一,并且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关于这种作物的记载也较为常见,故依据《魏书》等史料,本文把“粟”与“小麦”这两种作物作为讨论的主要对象。当然,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西州地区的作物品种较多,就粮食作物而言,除“粟”和“小麦”之外,还有“青稞”、“大麦”等常见作物。参见《唐神龙二年(706)白润屯纳官仓粮帐》,载《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 7 册,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372-373 页。

⑤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 8 册,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173 页。

⑥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 7 册,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367-368 页。

⑦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 7 册,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356 页。

⑧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 6《食货六·赋税下》,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09 页。

- 7 具录时价斛斗如前
 8 岁下市送都督
 9 壹拾捌
 10 碓前
 11 柒升貳合
 12 典焦玄素牒^①

从《唐典焦玄素牒为麦粟帐事》这份西州官府文牒可以看出,“计当课麦”、“计课粟”、“具录时价斛斗如前”以及“送都督”等内容都可以表明唐代西州地区征收的赋税种类应有“麦”与“粟”两种粮食作物。并且“小麦”与“粟”是等量折纳。据复原后的唐《仓库令》第8条记载:“诸仓出给,杂种准粟者,稻谷、糯谷一斗五升,大麦一斗二升,乔麦一斗四升,小豆九升,胡麻八升,各当粟一斗。黍谷、糜谷、秫谷、麦饭、小麦、青稞麦、大豆、麻子一斗,各当粟一斗。”^②从唐《仓库令》的出给规定可以看出,小麦、青麦、大豆等作物的斛斗出给与粟的比率相当,也就是说“小麦”与“粟”之间的折纳比率是1:1。因此,笔者认为,在唐前期西州地区,“租”的种类应是“粟”与“小麦”等本地所产的主要粮食作物。

综上所述,对于西州籍帐文书中“计租六斗”的特殊租税数额,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是与西州地区特殊的给田基准额(六亩)有关,因为西州地区地狭人多,唐政府结合西州的特殊区域状况对唐《赋役令》的规定作了灵活变通,因此“计租六斗”的租税数额也是唐代西州边远地区赋税制度特殊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又与唐《赋役令》对租税数额(每丁粟二石)的规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一亩基准额的永业田所对应的租税数额是粟一斗。因为唐代均田制下“宽乡”地区一丁的给田基准额是20亩永业田,对应的租税数额是“粟二石(20斗)”。比照“宽乡”的给田基准额与所应输纳的租税额,西州“狭乡”地区一丁的给田基准额是6亩永业田,因此租税数额则应是“粟六斗”。

从“计租六斗”与“租二石(20斗)”之间的关系来看,由于西州“狭乡”与敦煌等“宽乡”给田基准额的比例是3/10,因此,西州地区“计租六斗”的租税数额仅是唐《赋役令》所规定“租二石”的3/10。这就是说,西州和敦煌地区的租税数额与给田基准额两者的比例完全一致,租税数额是以给田基准额为基础。又因西州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也包括“粟”与“小麦”,而且这两种作物均符合唐政府所规定的“租粮”类型,所以西州地区“租”的种类主要应是“粟”与“小麦”等作物。

[参 考 文 献]

- [1] 韩国磐. 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 唐耕耦、陆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3] 张 弓. 唐朝仓廩制度初探[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李锦绣.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 卢向前. 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日]池田温.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8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2-133页。

②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486、494页。